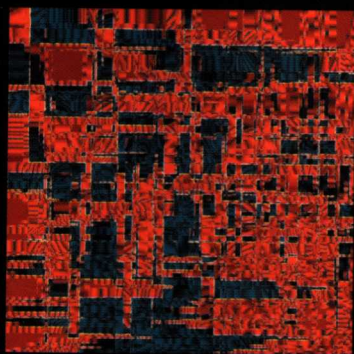


中國改革的政治經濟學



甘陽 崔之元 編

中國改革的 政治經濟學

編者

甘陽 崔之元

牛津大學出版社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Oxford New York
Athens Auckland Bangkok Bogota Bombay
Buenos Aires Calcutta Cape Town Dar es Salaam
Delhi Florence Hong Kong Istanbul Karachi
Kuala Lumpur Madras Madrid Melbourne
Mexico City Nairobi Paris Singapore
Taipei Tokyo Toronto

and associated companies in
Berlin Ibadan
Oxford is a trade mark of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First published 1997
This impression (Lowest digit)
1 3 5 7 9 8 6 4 2

中國改革的政治經濟學

甘陽 崔之元編

鄭謙序

© 牛津大學出版社 1997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7
ISBN 0 19 586607 X

All rights reserved. No part of this publication may be reproduced, stored in a retrieval system, or transmitted, in any form or by any means, without the prior permission in writing of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China) Ltd. Within Hong Kong, exceptions are allowed in respect of any fair dealing for the purpose of research or private study, or criticism or review, as permitted under the Copyright Ordinance currently in force. Enquiries concerning reproduction outside these terms and in other countries should be sent to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China) Ltd. at the address below

This book is sold subject to the condition that it shall not, by way of trade or otherwise, be lent, re-sold, hired out or otherwise circulated without the publisher's prior consent in any form of binding or cover other than that in which it is published and without a similar condition including this condition being imposed on the subsequent purchaser

版權所有，本書任何部分若未經版權持
有人允許，不得用任何方式抄襲或翻印

Printed in Hong Kong
Published b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China) Ltd
18/F Warwick House, Taikoo Place, 979 King's Road, Quarry Bay, Hong Kong

社會與思想叢書緣起

歷史悠久的牛津大學出版社從一九九二年起開始出版中文書籍。這或許預示着：中文這一為十多億人所使用的語言文字，在世界文化和學術的發展中將會日益取得其應有的地位。現在，牛津大學出版社又決定出版「社會與思想叢書」，俾更有系統地積累有價值的中文學術著述和譯述，我們希望，這對於中國學術文化的發展，將會起到積極的推動作用。

「社會與思想叢書」將首先着重於對中國本土社會與本土思想的經驗研究和理論分析。誠如人們今天已普遍意識到的，晚近十餘年來中國所發生的深刻變革，並非僅僅只是相對於一九四九年以來甚至一九一一年以來而言的變遷，而是意味着：自秦漢以來既已定型的古老農業中國，已經真正開始了其創造性自我轉化的進程。這一歷史巨變已經將一系列重大問題提到了中外學者的眼前，例如，鄉土中國的這一轉化將會為華夏民族帶來甚麼樣的新的基層生活共同體？甚麼樣的日常生活結構？甚麼樣的文化表達和交往形式？甚麼樣的政治組織方式和社會經濟網絡？所有這些都歷史性地構成了「中國現代性」的基本課題，同時恰恰也就提供了「中國傳統性」再獲新生的歷史契機。可以說，當代中國的這一歷史變革已經為中國當代學術文化的突破性發展提供了充分的歷史可能與堅定的經驗基礎，因為它一方面使人們已能立足於今日的經驗去思考中國的未來，同時也為人們提供了全新的視野去再度重新認識中國的歷史、中國的文明、中國的傳統性。有鑒於此，本叢書將不僅強調對當代中國的研究，同時亦重視對中國歷史的研究，以張大「中國現代性」的歷史文化資源。

「社會與思想叢書」的另一方面則是同時注重對西方社會與思想，以及其它非西方社會與思想的研究。如果說，晚近十餘年來的中國變革標誌着「中國現代性」的真正歷史出場，那麼，七十年代以來西方最引人注目的現象無疑莫過於對「西方現代性」歷史形成的全面重新檢討：在經濟領域，所謂「福特式大生產方式」的危機不僅促發對「後福特時代生產」的思考，而且首先迫使人們重新檢討「福特式生產」的歷史成因及內在闕失；在政治領域，西方現存體制與民權運動以來民主發展的尖銳張力，已重新激發西方近代以來「自由主義 v.s. 共和主義 (Republicanism)」這一基本辯論；在文化領域，形形色色的後現代主義不但已全面動搖近代西方苦心營構的文化秩序和價值等級，而且更進而對「西方傳統性」本身發起了全面的批判。所有這些都提醒人們：自上世紀末以來一直在學習西方的中國人，今天已不能不同樣全面重新檢討中國人以往對西方的理解和認識。因此，本叢書將不僅包括對當代西方的研究，而且更強調對西方歷史傳統的重新認識，特別是西方傳統內在差異性的研究。

本叢書定名為「社會與思想」，自然表達了一種期望，即：對社會制度層面的研究與對思想意識層面的研究，應該日益結合而不是互不相干。從學科的角度講，亦即希望社會科學領域的研究與人文及哲學領域的研究，能夠相互滲透，相互促進。通過多學科的合作與跨學科的研究去深入認識中西現代性與中西傳統性，以往那種僵硬的「傳統 v.s. 現代」、「中國 v.s. 西方」的二元對立思維方式或將會真正打破，代之而起的是人類對傳統與現代、東方與西方的同等尊重和相互理解。中文學術世界為此任重而道遠！

甘 陽

一九九三年十月

目 錄

中國改革的政治經濟學序	鄒謙	ix
導言：中國實踐對新古典主義政治經濟學的挑戰	崔之元	1

第一部分 中國改革的制度背景與組織基礎

1	中國非國有制經濟出現和成長的制度背景	錢穎一	41
		許成鋼	
2	中國產權改革的非私有化道路	華爾德	79
3	中國地方政府公司化的制度基礎	戴慕珍	99
4	束鹿縣個案：私有化的局限與國家的作用	布里查	133
5	國家和社會之間的第三領域	黃宗智	155

第二部分 市場機制、國家能力、國際環境

6	中國國有企業的非私有化改革道路及其成就	羅斯基	181
7	中國經濟改革中所有制問題的相干與不相干	盧荻	219
8	中國國家財政能力的下降及其後果	王紹光	253
9	中國在變遷的國際環境中	荻特瑪	299

跋：從經濟民族走向政治民族

——中國政治改革的中心問題	甘陽	335
---------------	----	-----

導言：中國實踐對新古典主義 政治經濟學的挑戰*

崔之元

一 引言

詹隼(Chalmers Johnson)、泰遜(Laura Tyson)和塞斯曼(John Zysman)曾說：「如果按照傳統的經濟分析，日本是因為有很多事做得不對，所以才成為一個重要的世界工業強國的。但很明顯，質之日本的可觀成就，真正不對的是有關經濟發展和國際貿易動力的傳統觀念。」(Johnson, Tyson and Zysman, 1989)這段話準確地表現了很多觀察者對日本看法的轉變。例如，「日本僱傭結構的特點，像企業工會主義、年工序列和雙重薪酬結構，最初是被當作將在經濟逐步現代化的過程中淡出的『舊』社會殘餘」(Aoki, 1984, p.3)，但曾幾何時，這種據稱是「過時」的僱傭結構，被普遍地認為是日本令人炫目的強勁經濟效益的組成部分。(Aoki, 1990)

我拈出日本這個例子的原因，是要提出一個類似的問題：在中國，我們是否也要經歷這樣的思想轉變？有些正在浮現的跡象顯示，我們可能要這樣做。一個顯著的例子是謝淑麗教授(Professor Susan Shirk)的新書《中國經濟改革的政治邏輯》

* 作者感謝阿爾格(Hayward Alker)、多爾(Ronald Dore)、甘陽、羅斯基(Thomas Rawski)、薩布(Charles Sabel)、史塔克(David Stark)對本文所作的批評。本文原題 The Challenge of Chinese Practice to Neo-classical Political Economy. 中譯：曾憲冠。

(*The Political Logic of Economic Reform in China*)——此書原題「中國經濟改革的政治缺陷(failure)」，然而她到前蘇聯跑了一趟回來後，認識到中國的經濟改革比較起來還是十分成功的，題目於是轉了。^①事實上，對本書各篇文章的最佳概括，也許便是它們提示了一個正在進行着的，對中國和東歐改革理解的範式轉移(paradigm shift)。

範式轉移往往由非常態的困結和吊詭激發而來。(Kuhn, 1973)就我們的情況而言，舊範式是新古典主義經濟學。此一範式的核心觀念是「矯正價格」(getting prices right)和「矯正所有制」(getting property rights right)。^②東歐改革的設計者是這一範式真誠的信徒：一系列被廣泛稱為「震盪療法」(shock therapy)或「大爆炸」(big band)的急速價格開放和私有化計劃，是新古典主義範式自然的政策歸趨。但與此強烈對比的，是中國並沒有實行「一步到位」的價格開放（見本書王小強的文章）；而且正如華爾德(Andrew Walder)在本書的文章中指出，正是在中國的集體所有制領域(地方政府所有的，特別是鄉鎮企業)，我們看到了最為強勁的經濟增長；還有，羅斯基(Thomas Rawski)的文章描述了中國的國營企業撇開很多它們在財政上得到「源源補貼」(on “red tap”)的事實，在改革

① 此節乃從私下交往中獲悉。

② 本文所指的「新古典主義經濟學範式」，即「矯正價格」和「矯正所有制」的理論基礎。前者係「福利經濟學第一定理」，後者係阿契安(Alchian)和德姆薩茲(Demsetz)的產權理論。值得指出，匈牙利著名經濟學家科爾奈(Janos Kornai)早期並非新古典主義經濟學家，他1971年曾寫作反新古典主義經濟學的《反均衡》一書。但是，在本人與科爾奈的私人交談中，他表示因《反均衡》在西方的評論很少，故他已不再堅持其中的論點。他近來的支持「震盪療法」的書《走向自由經濟之路》，很顯然是在新古典主義經濟學範式之內的。

中它們也是提高了技術效益的。因此，根據新古典主義「矯正價格」和「矯正所有制」的範式來判斷，中國的改革似乎是走上了歪路。然而，中國十五年的經濟改革(1978-1992)取得了國民生產總值8.6%的增長率，而東歐國家在「震盪療法」之後，國民生產總值每年的下降是兩位數字，用繆羅(Peter Murrell)的話說，這是「歐洲戰後最大的經濟衰退」(Murrell, 1993, p.216)。中國似乎是像日本那樣「錯有錯着」的另一個例子。

哈佛大學著名經濟理論家、美國工業利潤分成改革(profit-sharing reform)的倡議者韋斯曼(Martin Weitzman)，精確地抓住了中國的情況對新古典主義範式作出的挑戰，他說：「主要的悖謬，是中國的實際模式的巨大成就，和東歐模式的急上馬、試驗性而又較為失敗的經驗，形成強烈的對比。為甚麼理論和實踐在這個重要的場合竟好像是如此截然相反？」(Weitzman, 1993, p.553)本書的文章可視作回答這個重要問題的第一步。

我不敢將自己的觀點加給本書不同的作者，但我試圖提出，熊彼特觀點可以說明中國和東歐對經濟轉型的立場的重大分歧。更且，中國模式啓示了動態環境中的所有制問題，又超乎熊彼特之外。這篇文章的其餘部分將作這樣的安排：第二節指出我所謂的熊彼特觀點的兩個原素，而且點出它們對東歐的衰退和中國的增長所具有的意義。這一節可視作對新古典主義「矯正價格」概念的挑戰。第三節提出所有制和「動態效益」之間關係的問題。這是一個重要的熊彼特式問題，但熊彼特的答案並不令人滿意。對此，我以「高斯—哈特—漢斯曼—薩布」(Coase-Hart-Hansmann-Sabel)的理路提出一種集體或共同所有制的理論。這一節可視為對新古典主義矯正所有制概念的挑

崔之元

戰。第四節以和打破新古典主義範式攸關的政治哲學問題的討論作結。

二 新古典主義觀點對熊彼特觀點

我所謂的「熊彼特觀點」包含熊彼特的兩個命題：一是新古典主義經濟學實際上是一種實物交換經濟(barter economy)的理論，二是動態效益只能以靜態或分配效益在某程度上的折損來獲致。由於第一個命題不那麼有名，我會發揮多一點，而只會略為討論第二個命題。

熊彼特著作的一個固有主題是新古典主義經濟學往往偏向於實物交換經濟的「實質分析」(real analysis)：

實質分析來自這樣的原理，即所有經濟生活的基本現象都能夠以商品和勞務、有關它們的決策，以及它們之間的關係描述出來。貨幣只是以一種用來便利交易的中性技術手段的姿態參加進來。這個手段無疑也會出現毛病，而如果是這樣，它實在也只會產生僅僅從屬於它的運作方式的現象，然而，只要它運作正常，它就不會影響那和實物交換經濟運行得一般無異的（黑體為引者所加）經濟過程：這是貨幣中性(Neutral Money)概念的基本意思。(Schumpeter, 1954, p.277)

在這段引文中，熊彼特把「實質分析」和「實物交換經濟」通用是很清楚的。他不是要指出新古典主義經濟學完全不能把貨幣因素結合進去；相反，他強調新古典主義經濟學把貨幣這樣地結合，以至貨幣經濟仍然運行得「一如」實物交換經濟。由是，熊彼特之強調貨幣因素，不應與費利民(Milton

Friedman)的「貨幣主義」(monetarism)混為一談。事實上，正如費利民自己解釋，貨幣因素在他的仍然是一種實物交換經濟理論的「貨幣主義」裏，並不扮演重要角色：「撇開企業和貨幣在我們經濟中的重要角色，也撇開他們所引發的眾多而複雜的問題，藉以獲致協調配置的市場設計，其核心特點完全表現在既無企業，也無貨幣的單純的實物交換經濟之中。」(Friedman, 1982, 14)他著名於這樣的主張，以為大可假設貨幣是從直升機上掉下來的。(Friedman, 1969, p. 4)基本上，費利民的貨幣主義依然是一種有關貨幣「中性」的理論。反而，熊彼特強調「貨幣因素」——貨幣和信貸制度——並不是中性的。

新古典主義對於「實質分析」(即實物交換經濟)的偏向，可以在「震盪療法」式的標準穩定方案之後當前有關嚴重衰退^③的討論中清楚看到。大多數新古典主義經濟學家相信，「震盪療法」後的產出下降是不可避免，甚至是可取的；價格開放後的較低產出反映了經濟中諸般「實質的」(real)競爭力量——產出下降是由於淘汰了經營不善的企業和停止了沒有社會需求的生產所造成的。波蘭著名經濟學家維尼艾基(Jan Winiecki)清晰地說明了這一點：「行為的轉變不可避免地引致產出下降，然而福利水平卻保持不變。」(1991, p.669)立頓(David Lipton)和薩克斯(Jeffrey Sachs)也持相似看法。(1990)

我不想糾纏於這種關於產出下降的「實質」觀點其中所

③ 所有東歐國家，包括蘇聯，在1990和1991年都處於嚴重的衰退中，國內生產總值(GDP)的年均跌幅超過12%（比較起1989年的水平）。每個國家的具體數字可以在《歐洲經濟》(*European Economy*)增刊甲，1991年8/9月中找到。

包含的真實成分：在傳統的指令經濟下，的確有很多為人所不需要的「虛假」產出；而且，對整個經濟的一種健康的結構調整，也實在可能導致產出下降。然而，即使是非經濟學家的普通直觀，也會察覺到可能有其他造成衰退的獨立的「貨幣」因素：因為企業在出售它們的產出前，已須先支付投入和工資，^④僅由於它們受到嚴重的信貸限制——一個和企業「實質」經營效益(X－效益)無關的原因，便足以造成產出下降。換言之，如果我們把「貨幣」因素考慮在內，則不單是「劣等」企業，連「優等」企業也被迫降低了它們的生產。

為甚麼這樣簡單的外行人直觀，為當前關於東歐嚴重衰退的討論所忽略呢？現在我們該回到上面所引述的熊彼特觀點去：新古典主義經濟學事實上是一種實物交換經濟的理論。我相信，我們可以通過扼要回顧新古典主義的「貨幣與價值綜合理論」(integration of monetary and value theory)，完全體會熊彼特的觀點，而這一新古典理論是在熊彼特1954年出版了《經濟分析史》(*History of Economic Analysis*)後，由百廷堅(Don Patinkin)完成的。^⑤此一回顧特別有需要，因為百廷堅的貨幣中性理論是國際貨幣基金會(IMF)贊助的標準穩定方案的理論基礎。

百廷堅的核心主題是要把「貨幣」分析整合進現行「實

④ 正式來說，這可說是企業的預付現金限制。有關這個概念更多的說明，參考註⑨。有趣的是，馬克思可視作「預付現金」(Cash-in-Advance)模型的先行者，因為他強調貨幣—商品—貨幣(m-c-m)的序列。可以假定，這是熊彼特經常對馬克思保持興趣的主要原因之一：他們都把貨幣和信貸視作經濟發展動態過程中的關鍵。

⑤ 當百廷堅的《貨幣、利息和價格：貨幣與價值綜合理論》(*Money, Interest, and Prices: An Integration of Monetary and Value Theory*) (第一版，1965)是新古典學派對貨幣經濟看法的現代經典著作。此一看法在文獻中時常被稱為「華萊士—希克斯—百廷堅傳統」(Walras-Hicks-Patinkin tradition)。

質」分析的架構——競爭性總體均衡理論(competitive general equilibrium theory)——中去。他的理路乃是建基於總體均衡的預設，即每種商品的過度需求函數一致為零。讓他自己來說：

假設現在一個原先的均衡狀態被擾亂了，以至造成所有價格的等比例變化。由於這並沒有改變相對價格，於是，「一致性前設」(homogeneity postulate)意味着實質領域中沒有任何需求函數受到影響。(Patinkin, p.176, 1989 edition)

這是著名的「貨幣中性」(the neutrality of money)命題的表述，它通過把貨幣經濟和實物交換經濟等同起來，整合了貨幣分析和實質分析：「嚴格地說，只有在實物交換經濟向貨幣經濟的單純轉變並不影響均衡的相對價格和利息時，這樣的中性才成立。」(Patinkin, p.75)

由是，我們現在對熊彼特有關於新古典主義經濟學是一種實物交換經濟的理論的觀點有了更好的瞭解：不是因為他的觀點沒有提及貨幣因素，而是因為號稱中性的「貨幣」在其理論架構中並不扮演重要的「實質」角色。在百廷堅的理論中，編派給貨幣的唯一角色便是「實質」經濟的「名義制動器」(nominal anchor)：貨幣總供應量是決定絕對價格水平的名義變項，而相對價格則由經濟體系中的「實質」供求拉力來決定。

新古典主義的名義制動器理論對於東歐穩定方案的設計^⑥

⑥ 事實上，穩定方案的主要學者布倫諾(Michael Bruno) (1990)，清楚地提到百廷堅中性貨幣的理論是穩定政策的基礎。當然，正如本文的審稿人之一所指出，對百廷堅的貨幣中性論的理解是有爭議的。本文作者接受目前年輕一代貨幣經濟學家的看法，即新古典主義經濟學的核心基礎之一——瓦爾拉一般均衡理論——不能夠作為結合貨幣與實質分析的基礎。見Martin Hellwig 就任歐洲經濟學會主席的演說(1993)。

有非常強烈的影響。對於選擇何者為「適當」的名義制動器：訂定貨幣增長率還是固定匯率，投入了大量的注意力。⁽⁷⁾個中道理便是一旦選對了名義制動器從而絕對價格水平受到了控制，其餘一切事情也就可以留給由「實質」競爭力量決定的相對價格去自由發揮，而這就會帶來資源的有效分配。這幅通過價格開放和對名義制動器的操控以「矯正價格」的圖象，是何等乾淨利落！

建基於對名義制動器的選擇和價格開放的IMF贊助標準穩定方案（在東歐使用的），是新古典主義經濟學在宏觀經濟決策中佔主導地位的有力例子。然而，值得指出的，是競爭性均衡理論（「實質」分析）的重要人物阿羅(Kenneth Arrow)，從未在宏觀經濟分析⁽⁸⁾上運用這個理論。我相信，這是因為他充分認識到，基於對市場完善性的假設，作為交換媒介的貨幣在這個理論裏是沒有地位的：因為每種商品都假設在未來任何時候和可能的情況下均擁有其現價（此即市場完善性之假設），所以不需要現金（貨幣）以應付不確定的情況。⁽⁹⁾

⑦ 是白蘭查(Olivier Blanchard)等(1991, p. 6)。東歐大多數國家選擇匯率作「名義制動器」。

⑧ 另一個競爭性總體均衡理論的重要人物胡維茲(Leo Hurwicz) (1991)觀察到儘管阿羅的理論工作和競爭性均衡的效率有關，但他的理論應用工作卻全是關於市場的失敗（例如他對醫療服務的研究）。胡維茲認為，阿羅是有意這樣做來警告他的追隨者不要誤用競爭性總體均衡理論（例如百廷堅把貨幣理論結合進價值理論中去）。

⑨ 凱因斯經濟學教科書（希克斯的IS-LM範式）由於其對貨幣作為一項可持有資產的強調，只是表現了貨幣之為「價值儲存手段」。至於「疊瓦世代模型」(overlapping generations model) 所說的無盡時間，也只是解釋了人們把貨幣作為一項資產來持有的欲望。唯有哥羅華(Clower) (1967)的「預付現金」模型嘗試抓住貨幣作為「交換媒介」的角色。但是，如果我們還是在完善市場的框架裏打轉，那麼「預付現金」模型便可被批評為權宜設置。要把預付現金模型的局限內化，我們必須依賴非完善市場的理論。此外，儘管疊

新古典主義之沉緬於實質因素，忽略了震盪療法式穩定方案的重要貨幣效應，這對東歐的嚴重衰退也許有部分影響：^⑩

(1) 把固定匯率作為名義制動器（根據上文提及的貨幣中性理論），會造成很高的實質利率（好維護固定匯率）。這個因素加上補貼的削減和經濟互助委員會(Council for Mutual Economic Assistance, CMEA)的崩潰，迫使企業陷入嚴重信貸制肘的景況；

(2) （由於貨幣增長率也被用作名義制動器）中央銀行對商業銀行借貸的高貼現率和最高直接信貸水平^⑪進一步加劇了企業的信貸短缺。更且，即使沒有政府的最高信貸水平，商業銀行本身為了應付極度不穩定的情況，也會加強信貸配給；^⑫

(3) 由於(1)和(2)，企業三角債大增。

瓦世代模型可以解釋貨幣的存在，但它也沒有回答熊彼特的批評，因為正如前文引述的，熊彼特的觀點是認為新古典主義經濟學只是將貨幣的角色視作「用來以便交易的中性技術手段……不會影響和實物交換經濟一般無異的經濟過程」。

⑩ 在此情況下一個很自然的問題是：如果有的話，甚麼是標準穩定方案及其固有的衰退傾向以外的選擇？愛德華斯(Sebastian Edwards) (1992, pp.35–36)討論了四個解決貨幣這個癰疽的可能方法：(1)通過某種貨幣改革措施（限制或取消現行貨幣）降低名義貨幣的結餘；(2)一次過提高國內物價水平；(3)提高國內實質產出；(4)貨幣實質需求的增加。他把後二者當成是「不切實際和難以置信」而不加理會。然而，中國的經濟改革正是採取後兩種方法解決「貨幣癰疽」問題的。此外，Yoshio Suzuki (1980)有關1954年以來日本貨幣政策的研究，證明後兩種方法是很可信的。

⑪ 這項政策是對東歐非常流行的關於「中央銀行獨立性」的信念的反省。褒斯(Paul Bowles)和韋特(Gordon White)合著的文章包含了中國為何出於很好的原因避免了對「中央銀行獨立性」過分倚賴的有趣討論。

⑫ 史迪里茲(Stiglitz)和韋斯(Weiss) (1981)證明了商業銀行在一個資訊不完善的環境中最恰當的行為是信貸配給，所以，即使沒有政府的最高信貸水平，利率也解決不了信貸市場的需要。這重要的一點將會在下一節多加發揮。有趣的（且也諷刺的）是，新成立的私人銀行（匈牙利有13家，波蘭有36家，捷克有8家「只借錢給國營企業，認為東歐眾多的小型新公司風險太大」。（《經濟學人》[1991.9.21]）這是信貸市場上非政府信貸配給的顯著例子。

把這三個「貨幣」因素加起來看，它們意味着產出的下降並不單單是由於競爭拉力所致，很多「經營妥善」的企業（就其能在不利的宏觀條件下生存而言）也減少了它們的產量，甚至破產了。準確估計「實質」和「貨幣」因素對東歐嚴重衰退的相對影響，超出本文的範圍，^⑬但值得一提的，是對1990年波蘭穩定方案一項重要的經驗研究，顯示「貨幣」因素較具解釋力(Calvo and Coricelli, 1992)。^⑭我的觀點很簡單，新古典主義有關衰退的思想模式對貨幣因素的忽視是毫無道理的。^⑮「矯正價格」可以帶來經濟增長的信念，並不為東歐的經驗所支持。^⑯

倘若現在我們回到熊彼特的第二個命題，即靜態和動態效益之間的此消彼長，我們便可以對經濟增長的性質得到較深入的理論洞察：

⑬ 這樣的估計將會很困難，因為這涉及對立的事實：如果信貸困難不存在，產出的水平將會怎樣？由於資料有限，我在此不能作出這種估計，而只能指出估計的正確方法是「內在標準函數 (endogenous criterion function) 取代遞歸模型(regression model)」。(Maddala, 1988)

⑭ 正如卡伏(Calvo)和哥里薩利(Coricelli)所說：「信貸是投資新部門和技術，甚至有時是讓企業脫離困境的必要條件。假如經濟轉型過程要求收入像波蘭那樣短暫下降，則信貸便變得更為必需。如果沒有充足的信貸渠道，那麼譬如生產庫存產品的企業，可能會出現設備量非最優的下降。所以，如果沒有信貸渠道，最初的調整過程會給經濟烙下持久的負面印記，延緩增長復甦，增加社會緊張。」(Calvo and Coricelli, 1992, p.195)

⑮ 在「震盪療法」之後，交換系統膨脹了，而諷刺的是新古典主義經濟學的「實質分析」在這個意義上對了。

⑯ 世界銀行首席經濟學家費雪(Stanley Fischer)承認，東歐很多企業破產和產出下降的情況不是必然的：「假如經濟體系受制於價格變動，則勞工市場之缺乏彈性和金融市場之缺乏效率將造成不必要的破產和失業。但爭議之處在於逐步的價格開放是金融制度一種不完善的替代物，而它可使能夠生存下去的企業來完成這個制度。」(Fischer, 1993, p.391)我一方面欣賞他對於東歐衰退之為不必要的認識，另一方面，基於本節所援引的熊彼特邏輯，我覺得他對金融市場效率的信念也應該受到質疑。

由於我們處理的是這樣一個過程，它的原素須以長時間來透顯其真正特點和最終效果，所以評估這個過程在某個時間的表現是沒有意義的；我們必須在它展開的漫長歲月中判斷它的表現。一個在任何時間都充分利用它的可能性以臻善境的體系——任何體系，經濟的或其他的，長遠來說可能比一個永不這樣做的體系還不如，因為後者的缺陷也許正是長遠表現之速度水平的一個先決條件。(Schumpeter, 1961, p.83)

因此，就熊彼特觀點而言，靜態的低效益可能是動態增長所必須的。正如我們所知，新古典主義經濟學的核心概念是「帕累托效益」(Pareto efficiency)。它基本上是一個靜態概念，因為它只是關於給定的資源在價格機制下的最優調配。因此，對「矯正價格」的強調完全指向以靜態效益為代價的「動態效益」。這就是為甚麼熊彼特總是強調實質競爭並不是價格競爭，而是關於實行新的生產要素——新產品、新技術、新市場、新供應品和新組織形式——配置方式的競爭。(Schumpeter, 1934, p.66)此一洞見為中國的改革經驗所支持。儘管沒有全面的價格開放（見王小強的《摸着石頭過河：中國改革之路》），快速的經濟增長來自組織創新，就像錢穎一和許成鋼文章中討論的M-型組織。

更為有趣的，是在熊彼特的精神之下，「內生增長」(endogenous growth)理論的新發展正式地證明了完全競爭性價格機制不能推動發展，從而，偏離於完全的價格競爭對增長是必要的。(Romer, 1990)如果指出這個理論的主要發展人是「芝加哥學派」經濟學家的新生代羅馬(Paul Romer)，只會令它更具說服力。實際上，另一位年青的「芝加哥學派」經濟學家卡爾頓(Dennis Carlton)也發現，在美國，市場主要不是由價格來